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中國：鏡像／實像－評Giovanni Arrighi's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A Mirror or Real Image-A Review of Giovanni Arrighi's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oi:10.6752/JCS.200903\_(8).0011

文化研究, (8), 2009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2009

作者/Author：陳明祺(Ming-Chi Chen);陶儀芬(Yi-Feng Tao)

頁數/Page：214-21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11](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書評

《文化研究》第八期（2009年春季）：214-219

## 中國：鏡像 / 實像

### ——評 Giovanni Arrighi's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China: A Mirror or Real Image - A Review of Giovanni Arrighi's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righi, Giovanni. 2007.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Press. ISBN-10: 1844671046; ISBN-13: 978-1844671045, xiii+418 pp.

陳明祺

Ming-Chi Chen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當代中國研究學程召集人

陶儀芬

Yi-Feng Tao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中國即將取代美國成爲下一個世界霸權？美國霸權建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時刻像此時一般需要認真思考這個可能性。半個世紀以前，當中國領導人揚言「東風壓倒西風」或「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時，恐怕連論者本身都認爲這是一個長遠的理想，一種激動人心的口號，甚至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但進入了21世紀，美國因爲攻打伊拉克和金融海嘯而在道德、經濟、軍事上的霸權地位迅速萎縮，相對地，中國在經歷了90年代江朱體制的鞏固中央領導權威與正面迎向全球化的政經改革後快速崛起，這個命題不但是全球媒體捕

風捉影的熱門話題，也是各門各派知識分子激辯的重要論題。

世界體系大師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的新作《亞當·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下簡稱為ASB)即是一本主張並歡迎中國即將在21世紀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秩序領導者的重要著作。全書以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解讀為核心，強調18世紀中葉的亞當·斯密所認同的市場經濟(market-based economy)，有別於19世紀末的馬克思(Karl Marx)或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觀點，是不以改變一個社會的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為前提的，亞當·斯密在250年前尚未遭逢帝國主義入侵的中國已經看到這樣的市場經濟發展。阿銳基把這樣的發展模式稱為「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這是一種相較於西方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來得更勞力密集，更為國家官僚主導，更不為資本所宰制，也因此更不具資本主義的剝削性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性的發展模式。<sup>1</sup>

阿銳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經濟發展延續了200年前明清帝國時期的社會形構基礎，因此主張「在『新美國世紀計畫』(the 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失敗與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後，讓亞當·斯密250年前所發展的一個世界市場社會的願景，一個奠定在世界不同文明更平等地相處的社會形構之上的世界市場社會更可能實現。」(8)全書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集中在探討亞當·斯密學說，發展分析架構，第二至四部分則依此架構來分析以英、美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內在矛盾與敗象，以及中國另類模式的優越性與崛起之必然。

---

1 阿銳基認為，因為中國的國家一直都凌駕於資本之上，國家從來沒有成為資產階級的壓迫工具，所以雖然大量資本家出現在中國的年代早於歐洲，但中國並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見Giovanni Arrighi,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States, Markets and Capitalism, East and West," in *Japan Focus*, Jan. 14, 2008, Issue 2.

## 一、多重鏡像中的中國崛起

當全世界（包括美國本身）正在經歷美國極端右派意識型態治國的反恐戰爭與金融放任政策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的此刻，阿銳基提出一個以世界不同文明平等相處為基礎的世界市場社會發展願景，著實令人耳目一新。但為了要提供這個願景一個內在邏輯一致的理論基礎，阿銳基將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內容投射到250年前的中國，再把史學家（尤其是日本的中國經濟史家）對明清時期中國朝貢經濟的描繪投射到近30年來的中國經濟發展，使得ASB這本書中有關中國崛起的分析，相較於其他直接進入中國田野，透過實證方法研究活生生的工人、農民、資本家或國家幹部的中英文作品而言，更像是一個多重鏡像中的中國，映射的是主觀的願望而不是客觀的存在。以下從ASB中節錄的這段對中國發展特徵的描述便充分呈現了這種多重鏡像的分析：

簡言之，〔中國〕相對漸進主義式的經濟改革證明了新自由主義信條中的許多烏托邦信仰，如震盪療法、小政府、自律市場等，對中國的改革者來說，就像對亞當·斯密來說一樣，是莫名其妙的。在前面第二章有關斯密的市場發展概念的探討已討論到，政府應將市場看成是一個統治工具，以一種不打擾「公眾平靜」(public tranquility)的方式逐漸開放市場交易。讓資本家，而不是工人，相互競爭，如此資本家利潤極大化的傾向才能被節制在一個可容忍的範圍內。他們（中國政府）鼓勵在生產單位與社群之間進行分工，而非其內，並對教育投入大量資源，抵銷產業分工帶來人口智能不平等發展的負面效果。他們將政策的優先順序放在國內市場形成與農業發展上，做為工業化與長期外貿投資的重要基礎。(358)

絕大多數曾在中國本土親身經歷過去30年市場經濟發展的人可能都會發現這樣的描述太浪漫化了。例如，雖然阿銳基也看到中國從1990年代以來的國營企業下崗工人的抗爭和內外資經營的出口企業中農民工所受到的不合理待遇，但他仍堅持中國政府政策並沒有全然向新自由主義投降，比起其他相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中國在勞工福利與工作權保障上更照顧工人。(360)

## 二、「貓論」的實用主義其實比新自由主義更具社會破壞力

這樣的分析與事實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計：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工人福利與工作權的漠視程度連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都看不過去，雖然兩年前修訂了《勞動合同法》，但實際運作的情況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更不用說金融海嘯嚴重打擊出口之後各級政府在法令的執行上有走回頭路的現象；第二，或許在中央政府法規上沒有特別偏袒資本家的鑿痕，但地方政府官員在中央的財政包袱全面向下甩以及「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升遷考核指標的激勵下，用盡各種優惠政策招商引資來發展地方經濟，比如說減少社福支出，將本已困窘的地方財政資源賠本投入設立各式開發區「築巢引鳳」；另一方面在「和諧社會」的大前提下打壓工人、環保、愛滋病患和失地農民「依法維權」和「依法抗爭」，這都有利於資本的超級積累；第三，中國改革開放確實不以新自由主義或任何意識型態為指引，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原則是鄧小平的「貓論」為代表的實用主義，這種發展的功利主義破壞中國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的意願和潛力恐怕比大部分有意識型態束縛的國家來得高。例如，阿銳基甚為讚揚的高等教育擴張，事實上是教育商品化的結果，過去30年中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面商品化很大程度反映了各級政府對公民權觀念的負面轉變（從國家支付的公民權利與義務到市場定價的商品），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絕不如「貓論」這種凡事講求看得見的短期實效的行政原則，可以這麼快速地讓各級政府官員與教育行政主管「換腦袋」，讓創造收益成為教育機構發展的主要目的。

## 三、不平等不僅存在國與國之間

阿銳基主張東亞市場經濟可能比西方資本主義更人性、平等與和平，關鍵在於國家與資本的關係。阿銳基認為東亞的國家機器非但不為資本控制，反而可以凌駕其上創造環境讓無數資本家不斷進入市場相互競爭，以達成國富民樂的目標。所以，如歷史上的中國所證明，

東亞的國家不需要為資本主義服務——對內進行階級剝削、對外進行帝國主義擴張，以求資本利潤極大化。

但如同Joel Andreas所指出，這樣的國家與資本關係的基礎是東亞的家庭勞動體系(family labor system)。自明清到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包產到戶」的政策，家庭勞動體系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但隨著市場機制的引進，黨國壟斷的政治權力成為動員資源賺取商業暴利最有效的手段，權錢交易為基礎的官商資本體系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sup>2</sup>中央到地方多少官員子女換臉成為快速致富的企業家，撤除政治資本，這很難只用他們的人力資本或文化資本來加以解釋。而不具有先賦政治資本的民營企業或外資企業要在這樣的市場中立足，就難以僅僅依靠家庭勞動體系的自我剝削，而必須在政治關係上頭加強投資。<sup>3</sup>這樣的政治關係先天上有很高的交易成本與不確定性，所以讓規模較大的民營（比如說今年對家電零售集團「國美電器」的整肅）和外資企業很容易受到非市場因素的衝擊而退出市場，再加上今天中國國內市場許多產業都還是各級政府保護的國營企業壟斷汲取超額利潤的情況，所以國家權力其實是中國國內市場發展的最大阻力而不是助力。

自1990年代以來，官商資本體系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表面上各種不同產權型態的企業（國營、集體、民營）在同一個國內市場競爭，實際上決定競爭勝負的是左右取得土地、資金、市場通路能力的政治關係，在中國以權錢資源掌握多寡為機制的階級結構漸漸形成，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3成長到0.48，成為東亞最不平等的國家。阿銳基過分浪漫化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只看到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的縮小，沒有看到中國社會內部不平等加大，而在這樣的貧富差距拉大中，他所讚揚的國家權力不受節制卻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

2 Joel Andreas, "Changing Colours in China," in *New Left Review* 54 (November/December, 2008), pp. 123-142.

3 甚至在外商主導的加工出口產業也有這樣的情形，這是因為地方政府掌握了出口退稅、土地價格和減免行政干擾等制度規範模糊地帶的法令詮釋和行政權力。

如果把視野放在阿銳基所熟悉的世界體系的層次，阿銳基認為中國的崛起並沒有像歐美幾個資本主義大國興起那樣對外進行帝國主義式的擴張，造成國家與國家間的不平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其實也違反了世界體系理論在解釋上強調結構優先於個別國家意圖的方法論主張，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究竟代表的是不同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物種（因此會一直反帝反霸下去）？還是因為內部尚有工資低廉供應充沛的勞工造成的龐大剩餘價值可供汲取，還沒進入最高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興起是一種霸道的崛起？還是一種王道的實踐？這還需要留待時間來驗證。但是近幾年中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地區尋求礦業資源的渴切以及介入幾個陷於內戰國家交戰團體之間的爭議程度，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結構力量。

國內市場的政治化與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都限制了中國國內市場的發展。1990年代下半起，中國從東亞其他國家吸引更多出口製造業生產轉移，以成為世界工廠的方式來維持高速經濟成長。這正是中美貿易失衡與中國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根本原因。中國之所以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成為世界工廠，阿銳基所談到的因素，如海外華商網絡的世界經濟實力、毛時期在農業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產（土地改革、教育與醫療資源普及化），確實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但這些都無法否認一個事實，這無數的出口製造業之所以能夠在世界市場競爭脫穎而出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他們能夠在各級政府的協助下最有效率地汲取中國廉價的勞動剩餘，滿足以沃爾瑪(Wal-Mart)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需求。這樣的中國崛起多大程度能夠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其實是相當令人懷疑的。

總之，本書最大價值在於它指出了工業革命之後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其所衍生的國際政經秩序在整體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中其實是偶然而短暫的，這對於習慣將資本主義與英美霸權視為必然的讀者有很大的啟發。此外，本書對英美資本主義霸權的深刻批判與反省也讓讀者對於現代性的想像得到很大的解放。但由於作者多半是從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反省批判的對立面來想像中國的經濟發展，所以有關中國崛起的實際過程與其對世界政經秩序的意義都有過於浪漫化之嫌。